

# 第一章

## 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的提出

### ——结构调整与出口导向工业化

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 / 安德烈·莫门

保护主义被新自由主义者看做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威胁。由于贸易壁垒会使相互竞争的进口商品与国产商品的价格都上升，它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的减少。保护主义使得当地厂商缺乏积极性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占领新市场。保护主义还会导致贸易伙伴的报复，挑起报复的恶性循环，并削弱国际银行体系。

但是，向自由贸易的转变也有成本。自由主义意味着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不得不把它们的资源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地区，这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会被所有的消费者平等分享，但是遭受廉价进口商品冲击的生产者们可能会迫使政府进行干预。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尝试着减缓采用开放的贸易政策以捍卫国家的独立。那些对于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生产，将可能通过国家介入生产作直接的支持，而不是通过保护作间接的支持。在经济的其他部门，当国家的利益要求无效率的工厂或部门继续生存时，关税和临时性安排仍然是政府强有力的工具。

然而，贸易完全自由化的主张人数和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没有必要采用特殊的手段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抵抗国外的竞争。因为他们怀疑政府的干预能否有效的治疗市场的失败。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们还是成功地在政府中获得了大量听众和重要的影响力，使他们得以提出自己的政策作为解决政府面临的平衡预算、促进经济增长等困难的实践方案。因此，市场导向

的改革获得了正在寻找解决经济危机和财政问题的方案的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们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者们反对政府实行赤字政策和不平衡经济增长政策，而且，他们认为贸易平衡问题可能和政府耗尽私人储蓄、增加进口以满足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而造成的预算赤字无关。从国外借得的大量债务虽然能够帮助平衡贸易赤字，但最终会由于债务的增加导致贫穷，因为，为偿还外债而增加商品出口会使本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为了抗击这种扭曲，新自由主义者们提出了反对贸易保护论威胁的办法。他们相信所有的国家将从多边自由主义化中获得好处，就像从与比较利益原则相一致的贸易模式中获得的益处一样。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区或者共同市场提供了新的前途，而且自由贸易的安排使得参加的国家接受共同规则。但是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的风险使它们有可能打破世界贸易体系，变成区域性集团。这将使得在区域性集团内的贸易更自由，而在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之间进一步分割。边境背后的壁垒（不同的技术标准、不同的安全和环境规则、不同的反托拉斯政策、不同的税收体制、不同的其他惯例）在贸易集团和共同市场内部的存在，继续阻碍着国外的供给。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全球贸易制度，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经济的增长假定与储蓄率的提高和边际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它与通货膨胀和无收益的进口的下降相关）实现定性和定量的转换。新自由主义认为对经济的刺激因素包括：税收与政府支出改革、利率改革、汇率改革、对促进出口的重视和对国际市场价格的信心。既然这样，出口偏好允许有效率的产业发展自己而不囿于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出口偏好也会导致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增加外汇的份额以减轻经济对国外资本输入的依赖。

在这一章里，我们想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如何征服世界并改变发展日程的。自由化刺激了东欧的政权制度转换的进程，也迫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自由市场法则来复兴他们的经济。虽然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沿着

他们经济发展的轨迹有一个自动的联系的说法仍然是个假说。由于现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与 20 世纪前 50 年相比大大减少，以及面向国内的刺激经济增长方案的失败，国外的需求对推进经济扩张和资源的分配是有益的结论已经走到了前台。新自由主义者宣称贸易保护的消除将产生福利，因为如果导致福利减少的垄断被消除，寻租行为被防止，成本将减少，国内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也就会得到提高。

## 一、新自由主义与国家

尽管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增加，但国家由于他们对国际与国内经济联系的控制而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仍然是主要的参与者。此外，不同国家对于来自外部的压力并不会作出一致的反映。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围绕着积极的出口战略与商业集团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当一些国家采用市场导向的改革以解决经济后退的问题时，发展战略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进一步说，在最近十年里，很多国家经历了民主的转变，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以应对由于大量债务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引起的世界经济的急剧衰退和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的影响。最初，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预先改变政策来应对这些来自外部的冲击。然而，外汇的短缺迫使他们作出调整（在很多情况下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帮助），最终很多国家转向了市场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拉丁美洲的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的军事政体下开始结构转换，后来在完成了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实现了民主政治。正如拉丁美洲一样，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而且，最近他们也不断受到要求扩大民主的困扰。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战胜专制和中央统制经济的胜利是与推进经济开放和通过促进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以支持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开放政策的努力相联系的。但是，那些经济改

革失败的国家则是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迫而实行结构调整政策的。

对于发展经济学家们而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表明市场导向政策和参与世界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药方”使得陈旧的政策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和保护主义中解放出来。新的增长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的重要性，这已作为激发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部分被广泛地接受。此外，东欧的衰败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崩溃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表明试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维持经济增长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实际上所有成功推行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在政府引导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限制中开始出口产品的。当注意力集中在用本地的产品满足国内的需求时，他们的进口替代战略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土地部门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初的阶段，当他们的进口替代政策侧重于试图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资本产品部门时遭到了失败。这种方式不仅没有促进生产的增长，反而带来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压力、周期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普遍存在的城市失业等问题。

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同拉丁美洲相似，进口替代战略是对约束的一种反应。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中，进口替代战略持续推行的时间都没能超过十年。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是在大萧条与二战期间采用进口替代政策的。在非洲，进口替代计划在 1974 年之后崩溃，并被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抛弃。在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被旧的官僚统治者和矿石出口商们推翻，自由主义的精英们潜心于商品出口活动——存贮、装船、运输。在亚洲，所有的国家（不仅是印度，还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都着手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最后，这些政策被证明在创新性方面不如东亚独裁政权，他们推行了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

东亚政权非但没有因区域联合的存在而削弱，反而在官僚集团和商业利益集团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出口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在独裁政权的支持下被优先考虑和实施，并带来了宏观

经济的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竞争性的汇率。随着东亚成功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不断巩固，政权的自由化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政权开始走向政治结构的民主化。他们能够坚持竞争性的汇率和实行贸易的自由化而不必改变他们的出口推动政策。当然，一些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在从进口替代经济向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中，则不得不面对解决过度通货膨胀、扭曲的工资水平、缺乏效率的企业等问题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国有企业不得不实行裁员甚至倒闭。货币贬值使那些依靠进口的部门受到损失，并引起物价的上涨和城市的失业率上升。

在拉丁美洲，军事政权首先推行了出口导向改革。稍后，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使得需求得以复兴，宏观经济得以保持稳定。这也为一些南部拉丁美洲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的后独裁政权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

在非洲，在东欧剧变之前，托管的传统阻止了官僚政治精英们打破独裁统治。围绕着托管的直接无效的行为和腐败被带进了转变后的民主政治。一些最近建立的“民主”政府甚至拒绝处理保护贸易论者的租借行为和国家的货币估价过高。自由化意味着对那些从保护贸易论者倡导的进口替代政策中获取利益的人的一种直接冲击。国家保护就业和一定的垄断是普遍接受的实践，东亚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这样做。（日本和韩国仍然是保护本地的稻谷种植者，尽管这一地区的传统食品出口国家要求实行低一些的进口税。）

## 二、结构调整计划

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十年内的银根放松，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过度借贷。当 80 年代初期利率急剧上升、债务到期时，他们便遭受到了冲击。这时，外汇收入远远低于所需要的花费，这些国家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支出以偿还外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迫使他们调整经济。在 70 年代末，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和与此相关的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使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调整战略计划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结构调整计划更加强调那些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要采取结构调整措施以促进对国内资源的利用，减少价格扭曲，保证增加进口渠道并重新安排优先投资的项目。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赞同”原则覆盖了从所有其他来源获得信贷的渠道，他们能够迫使发展中国家遵守结构调整计划。

经济增长缓慢、出口不畅、高额债务负担和财政收支不平衡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债务国不得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出口而将自身的社会稳定置于一边。这种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债务国能够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从而有足够的外汇收入偿还外债。通过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多么贫穷。

正是依靠这些计划推动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使得由市场决定的价格能够影响生产水平和消费模式，支持出口，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进一步朝外部市场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债权国被要求减少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如果后者愿意执行结构调整计划的话，这是必要的。因为减少了利息支付能够改善南方贫穷国家人民悲惨的生活条件。但是，作为交换，偿还外债也是必要的，这能够鼓励这些国家想方设法增加出口，并把他们贫瘠的资源投入到那些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

在自由市场上，那些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的思想观点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得到了传播，商品、劳动力与货币必须能够超越国界自由流动。国家必须开展贸易，交换商品并发展那些“可贸易的”成分。这种迫使那些潜在却很勉强的参与者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机制，是一套被称为结构调整的经济政策，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坚持不懈地执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结构调整计划的目的是提高出口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实行工资和价格稳定政策与提倡节俭相结合来刺激私营成分的发展。结构调整计划包

括下面一系列措施：

1. 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减少缺乏效率和政府保护的垄断；
2. 实行高利率和信用紧缩以减少通货膨胀趋势；
3. 实行贸易自由化以打开国内市场，使本国工业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4. 实行国内需求管理以降低国家预算和减少社会部门的支出；
5. 实行货币调节以通过提高进口产品价格和使出口部门更具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平衡；
6. 实行市场自由决定价格以改变由于食品和肥料补贴和对进口奢侈品实行关税而产生的价格扭曲。

制度改革的引入是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相结合的，而社会保障体系变革的完成则伴随着新的趋向使社会服务部门私有化的计划。这些调整使得有必要进行宪法改革，并由此导致司法程序和制度的变化。结构调整计划立足于传统的途径。与收入分配相比，他们更注重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使人联想起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战略。结构调整计划旨在重新全面调整国内的支出和生产模式以把经济带回到稳定而平衡地增长的道路。稳定化和结构调整贷款的推行旨在通过支出方式的改变来减少总需求的水平，达到克服短期不平衡的目的。这通常意味着预算赤字的减少，价格恢复到市场水平，贸易和货币贬值的自由化以及对货币供给和信用的从紧控制。

结构调整计划主张的改革是从着眼于根本地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前提条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既不是维持以前的进口替代政策，也不是通过有选择的开放国内经济来加紧工业化进程。考虑到：用休克疗法代替民粹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的主张的提出，经济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被认为应对高通货膨胀率、失业、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贸易赤字、生产体系缺乏效率等等经济问题负责。后来，国家的干预不得不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服务的组织（防务和司法部门），法律和规则的制定以及为私营部门不愿意投资和提供服务的领域提供支持。

从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大约有 30 个非洲国家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赞成和支持下采用了结构调整计划。一开始，结构调整计划常常被中断，然后重新进行谈判（如扎伊尔、塞内加尔、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但是，到 1986 年大多数非洲国家无论是否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帮助，都开始着手推行结构和财政恢复计划。虽然有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是没能改革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外债在 1982 ~ 1990 年期间翻了一番多，达到 1640 亿美元。

在拉丁美洲，结构调整计划在 70 年代被独裁的军政权引入和采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Ugarte 在智利，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 Jorge Rafael Videla 在阿根廷），并把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与由冷战思维产生的国家安全思想相结合。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放弃以前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并确定了以对出口初级产品进行重新评估为目的的政策。即使是在像墨西哥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习惯于镇压任何形式的公开反抗），米戈尔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也推行了结构改革。在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独裁政权向民主政治转变之后，5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也被新自由主义代替。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成为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战略与以前推行的进口替代和对受保护的经济部门实行补贴的战略是根本不同的。

这种战略选择有助于削弱劳工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减少中产阶级激进思想的影响。减少国家干预引起了在知识能力第一及随后的中产阶级的“私有化”影响下大量失业的出现。因为社会需求已从国家干预的范围转到了市场力量作用的范围。社会组织的解体迫使太多的人不再通过社会组织推行的集体管理而是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家卸下了社会负担，又不得不处理不断增加的社会分化必然带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

### 三、非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非洲经济恶化是国内政策失败的典型，而国家的制度因素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部的不利因素虽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管理不善却错过了很多机会去应付不发达的问题。糟糕的投资战略设想和执行导致了严重的对外不平衡，而这些对外账目的发生是在工业国有化、无效率的公有企业的建立以及扭曲的补贴的分配之后，是不适当的大规模投资的结果。

在独立之后，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他们的外汇仅仅靠出口一两种商品获得。由于这些商品的供给非常充足而且同样的商品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也非常容易得到，因而，他们的价格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由于非洲独立之后继承了的经济结构，外生的因素不能被消化，也妨碍了经济改革。新非洲的经济不仅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冲击，也容易受到进口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设法发展进口替代产品，但他们的国家执行机构考虑更多的是达到这样的目标以维持政权，而不是实现发展的目标。由继承得到或由改革产生的体制结构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加强了在非洲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统治阶级的寻租行为的毁灭性影响。缺乏管理能力的国家控制带来了完完全全的失败。政府对价格制定和外汇分配的干预导致汇率估价过高，不仅抑制了出口，也使得政府执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切实际和不可持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缺乏外汇支付中间产品的进口，再加上为使产品能卖掉而对市场进行控制，都对非洲经济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农业部门的停滞正是由于农产品出口的赋税沉重和管理不善的结果，即使在那些没有遭受政府对生产和市场的干涉的小农部门的国家也是如此。停滞发生在那些正式部门的衰落、管理不善引起制造部门破产的农业国。

表 1.1 农业特征 1978~1980 年)

|      | (1)  | (2) | (3)  | (4) | (5)  | (6)   |
|------|------|-----|------|-----|------|-------|
| 非洲   | 69.8 | 1.5 | 1.7  | 1.4 | 8.2  | 850   |
| 远东   | 62.8 | 1.0 | 24.8 | 2.0 | 35.1 | 1 700 |
| 近东   | 54.0 | 2.5 | 21.4 | 6.6 | 33.0 | -     |
| 拉丁美洲 | 34.7 | 4.5 | 8.6  | 5.4 | 42.2 | 1 600 |

- (1) 人均可耕面积 (公顷)  
 (2) 灌溉面积占耕地的百分比  
 (3) 每千公顷拥有的拖拉机数  
 (4) 每公顷耕地施肥量 (公斤)  
 (5) 收成 公斤 / 公顷)  
 (6) 谷物产量 (公斤 / 公顷)

资料来源: Jamal and Weeks 1993:9

80 年代, 非洲的生活水平在经历了 30 年的缓慢提高之后下降了。遗憾的是, 很难找到可靠的统计资料, 他们只能提供偏离现实的资料。因为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非正式部门和为自身生活而进行农业生产的部分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而这部分并没有统计在内。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 与拉丁美洲和亚洲相比, 非洲国家的生存更加依赖于农业 (见表 1.1)。尽管官方的数据已被证明对了解非洲贸易的趋势是没什么用的, 国民收入的数据也是不可靠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 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有 49 个国家属于不发达国家, 其中有 29 个国家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因为他们不仅非常贫穷, 而且制造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 在 1988 年, 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从博茨瓦纳的 1 654 美元到埃塞俄比亚的 121 美元不等。所有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均年收入为 340 美元, 而在 1988 年撒哈拉以南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年收入为 430 美元。从 1962 年到 1990 年,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2.5%,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 4.04%, 而在非洲每年仅增长 0.8%。包括南非在内的撒哈拉以南的全部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水平远低于只有 1 500 万居民的荷兰 (见表

1.2)。

表 1.2

年均增长率

|            | 1962 ~ 1990 年 |      | 1962 ~ 1975 年 |      | 1975 ~ 1990 年 |      |
|------------|---------------|------|---------------|------|---------------|------|
|            | (1)           | (2)  | (1)           | (2)  | (1)           | (2)  |
| 世界         | 1.80          | 1.63 | 3.15          | 1.59 | 0.58          | 1.67 |
| 发达国家       | 2.58          | 0.55 | 3.92          | 0.77 | 1.95          | 0.36 |
| 非洲         | 0.80          | 2.19 | 2.27          | 1.95 | 0.57          | 2.35 |
| 亚洲         | 1.89          | 2.46 | 1.20          | 2.43 | 1.95          | 2.50 |
| 东亚 / 太平洋国家 | 4.04          | 1.70 | 4.63          | 1.83 | 3.43          | 1.59 |
| 中东         | 2.14          | 2.61 | 4.91          | 2.33 | 0.75          | 3.08 |
| 西半球        | 1.13          | 1.49 | 2.59          | 1.53 | 0.29          | 1.50 |

注：(1) GNP

(2) 人口

资料来源：Passé - smith 1993: 18

在非洲，最令人震惊的衰落是制度能力的衰败。腐败、犯罪、搞裙带关系和镇压成了所有非洲国家的共同特征。一些政权和他们的官僚统治者们极端的残忍，并把他们的统治当成进行掠夺的机会。经常使用的酷刑和谋杀成了他们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他们的继任者也常常对人权和自由漠不关心。这些政权中的大多数在试图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处理他们的殖民地过去的遗留问题时遭到了失败。军事政权成为经济失败的结果，大多数非洲政权依靠部族支持和官僚政治来控制人民。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增多的暴力和社会不稳定，并把很多非洲国家引上了国家分裂的道路。

结构调整计划的负效应激起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愤怒，他们在两个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进行了报复。这两个报告是：《统计与政策：非洲经济委员会关于世界银行报告的初步评论》和《80年代非洲的调整增长与非洲选择性的结构调整计划（AA—SAP）：改革和恢复的基本框架》。报告指出：除非其他非洲国家的货币也贬值，否则货币贬值将导致进口食品和机器设备价格上升，并促使商品出口增加。当食品价格的上升并没有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时，由于相对收入的下降，城市的消费者和当地的工业成为

货币贬值的主要受害者。另外，世界市场价格的下降使得放开价格的影响失效，而需求管理又减少了预定要投向当地发展项目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高利率不仅导致了小企业破产，而且提高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此外，进口的自由化提高了对于外国供应者的依赖程度，并产生当地企业被外国接管的趋势。托管式的私有化导致了企业的破产，以及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企业被外国资本接管后却没有促进投资的增加。

尽管如此，世界银行还是表明，只有不断增加出口传统初级产品才能获得支持和救助。非洲国家不得不寻找他们自己的资源进行对外贸易以发展自己，也不得不通过获得外汇来促进自己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通过出口更多的传统商品来提高他们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尽管大多数传统商品的前景十分暗淡，非洲的出口市场也在不断萎缩，但结构调整计划还是特别关注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低质量的纺织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生产（和加工）需要输入生产资料，而非洲国家无法依靠出口收入或者储蓄筹措到所需的资金。出口导向战略要求实行进口限制和进口替代，严格控制外汇的使用以及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只有能够慎重地决定投资项目的强有力的政府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而且在对进口和价格实行一段时间的严格管制之后向国外竞争者完全开放国内经济和市场，才能实现资本的积累。但在非洲国家，这些都没有实现。

可能引起争议的是非洲经济既缺乏技能，又缺乏机会来加工他们自己的原材料。此外，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太小了，很难发展起国内的资本市场，也很难动员足够的储蓄实现大规模生产。而且，出口导向战略要求拥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港口设施、公路、电厂、长途通讯等），但很多非洲国家都没有直接通道到达主要的国际港口。

就非洲来说，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然而，如果不能得到更好的技术，发展也将成为一种狂想。非洲的商品生产者甚至由于对传统的采矿业和农业部门的投资率下降而不得不减少他们的

出口量。他们的财政危机是如此之深，债务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至于他们无法改变生产赖以进行的经济结构。因此，非洲国家初级产品的生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大比例。这种情况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容易受到这些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这一“药方”有一定关系，因为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意味着进口的强劲增长以及土地的使用和矿产的开发的加剧。另外，当经济作物代替了粮食作物时，粮食进口将增加（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非洲的粮食进口已经在增加）。出口用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化肥和水利工程投入的增加。粮食价格的下降挫伤了非洲农民为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增产的积极性。最后，非洲的农场主们竞争不过来自欧洲的得到了补贴的粮食进口，而更愿意从事受到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在一些国家，建立在村庄经济的基础上的生存农业已经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而被打破。在非洲，为满足市场需要的粮食生产始终在稳定增长，但是，由于所有的非洲国家为了获得出口收入而竞相增加经济作物的出口，他们正在扼住自己的咽喉，破坏自己的整个生存支持体系。依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他们保护缺乏效率的产业，通过设定价格和把自己货币的汇率提高到一个使出口缺乏竞争力的水平来干涉市场。此外，非洲国家的政权还通过直接税征收税金而使市场分割，他们把税金转移到非生产性部门，阻碍了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把非洲政权用来为他们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的租金分为五种形式：关税收入、对国内制造业的保护、垄断的市场分割、外汇的分配以及滥用投资基金开展非市场活动。此外，保护主义特别关爱当地缺乏效率的生产部门，政府提供的补助使资源从生产性用途转向昂贵而又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国家控制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尝试已被证明是不可缓解的失败，还引起了难以支撑的收支不平衡。另外，非洲国家无法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当地为熟练工人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因此，与利用外汇进口商品相比，利用外汇在当地生产商品的成本要高得多。

当然，一些为非洲提供的新投资形式（管理协定，技术许可证协议等）是重要的，而且各种形式的转包合同也在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被执行。共同生产的协议有助于外资的流入。在毛里求斯就发生了产业成功的故事，他们的政府为了应出口商品单一的局面，建立了出口加工园区。在 1970 到 1985 年间，一系列的刺激政策（自由贸易，税收减免，资金和收益可以自由汇往母国，当地的财政和基础设施支持）吸引了大约 400 家外国厂商和一个强大的香港商团对其纺织和服装产业进行投资。当时，这个香港商团正在抗议多边纤维协定（MFA）给他们的输往工业化国家的配额太低。但是，从 1989 年开始，高工资的压力使得出口园区的吸引力下降，毛里求斯的成功也因此而受到影响。这表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只有在工资很低的时候才会奏效。

建立成功的出口园区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一个有利的外汇汇率。在塞内加尔，因为直到 1994 年，它一直受到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对法国法郎汇率偏高的影响，所以，尽管政府实行了总体上的免税政策（免除进口税和 25 年的直接或间接税），它的出口加工园区还是不那么成功。在蒙巴萨（肯尼亚）和多哥也建立了出口园区，但由于外国投资者完全回避非洲而没有获得成功。结构调整计划并不总是带来外资的流入。加纳贯彻了全非洲最有力的结构调整计划，但基本上没有成功。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结构调整的步伐缓慢，但也能吸引外国投资，因为在很多非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依赖于能否进入国外市场。

欧洲是非洲的主要市场和投资伙伴，但由于欧洲有它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它对发展中的非洲的兴趣就不如美国和日本对它们各自地区市场的兴趣大。此外，不久前东欧对西欧资本的开放使得非洲变得边缘化了；美洲自由贸易集团的兴起和日本环太平洋框架的出现加强了把非洲排除在地区一体化之外的倾向，并使得非洲无法在海外建立独立的吸收投资网络。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继续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非洲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很可能继续被边缘化

## 四、东亚模式

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和起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东亚国家之所以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加成功是因为他们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行事。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性，而政府则在提供公共产品和企业为获得成功所必须的稳定的宏观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除非市场失灵。

在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并没有为新自由主义教条所约束，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虽然，东亚国家与日本相比，经济实力还是相当小的，他们的重要性也常常被夸大。但是，东亚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经从资本主义的“外围”步入“半外围”。特别是韩国，已经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新的工业巨人。到 1988 年，它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超过了墨西哥和巴西而同葡萄牙大致相当。在 1986 年，韩国就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产品进口国。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这在世界市场上是成本和产品规格竞争力的标准）的上升使得韩国和台湾地区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在大多数半导体内存芯片的生产上获得了成功，并领先于所有的欧洲企业。今天，韩国出口大量的计算机、汽车、轮船、钢铁和建筑材料，对世界经济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拿出几个标准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韩国和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亚洲国家比其他穷国要成功得多，这也反驳了 70 年代那些左派批评家对不发达的原因所作的评论。从对发展政策的毫不干涉到高度干涉，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使用了各种非常不同的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的多样性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亚洲发展模式。但一般来说，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稳定的宏观

经济和积极的人力资本投入。

这些亚洲国家的辉煌成就体现在几个共同的特点上，例如，出口的高速增长，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等等。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两倍；是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的三倍；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快五倍；甚至比中亚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成绩还要好。最显著的特征是制成品出口和为国内高储蓄率所支撑的有形资本的高速增长，以及农业产出和农业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亚洲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集团都要快得多。它们以年均 5.5% 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的速度创造了比拉丁美洲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除具有丰富钻石资源的博茨瓦纳外）更加辉煌的成就。

而且，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不很严重。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逐渐与快速增长期以及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稳定下降的过程取得了一致。农业的相对下降并不是由于农业自身的发展缺乏活力，而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太快。东亚国家的政府一直支持对水利和其他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且投资于高产的农作物和与农业有关的制造业（电力、肥料以及机器设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减轻了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增长战略的压力，并且有利于防止政府对农产品征收重税或高估本国货币以及对那些生产农业投入品和农户需要的商品的国内工业部门的保护。对农业征税低和积极的保护使得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避免了把农业的资源向工业的过度转移。转移相当程度上是自愿的（金融储蓄），并且没有阻碍农业的增长。

作为一个整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8% 上升到 1980 年的 13% 和 1990 年的 18%。这种增长率是通过出口制成品获得的。例如，在 1965~1990 年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它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由 8% 增长到 12%。在 1970 至 1990 年间，“四小龙”占制成品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比日本快了 4 倍。三个亚洲东南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经历了依靠矿产品出口的时期

之后，于 1980 年前后创造了与前者相似的制成品出口高峰（稍微低一点）。

在八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日本），实物投资和储蓄率上升很快，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们把投资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虽然，这八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私人投资比重非常高，但公共投资依然处于重要地位，并且被作为经济紧缩时期私人投资下降时的一种反周期工具。（在其他国家，公共投资率降低是宏观经济调节中实施财政紧缩的反映。）此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也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在 1965 年前后小学入学率增加了 70% 以上，韩国和台湾地区优良的中等教育水平体系已经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只有泰国在这方面有些落后。

甚至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 1979 ~ 1989 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9.4%，其中在 1982 ~ 1988 年间达到了 11.4% 的高峰。在经历了短暂的紧缩整顿（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 1989 年为 4.4% 和 1990 年为 4.1%）之后，在 1992 和 1993 年开始复苏，实现了 12% 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类似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对出口的鼓励和推动以及对农村的改革。改革使得农民更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市场上买卖农产品。中国的出口推动政策包括税收改革、货币贬值和进口免税。在南方各省，那些能够吸引香港和台湾的大量投资并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地区，生产力提高最快。

## 五、拉丁美洲的开放

拉丁美洲地区从 1990 年起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 1990 至 1994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达到了 3%。秘鲁、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经济正逐渐从不景气中走向复苏。从 1990 年到 1994 年，